



裂痕

前南斯拉夫

● 洲東南隅的巴爾幹半島，曾經融合不同族群、宗教的國家——南斯拉夫，在統治多年的強人去世後，爆發慘烈內戰，分裂成：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蒙地內哥羅、波士尼亞、馬其頓、科索沃七國。二十年過去，但就如波士尼亞這棟空蕩的大廈，戰爭的記憶，難以告別。

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雍(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穿越粗糲山脈與險峻深谷，墨綠色的河水蜿蜒過波士尼亞與塞爾維亞的邊界，看似平靜的德里納(Drina)河，實則在歷史的浪潮中波濤洶湧。

夾在鄂圖曼土耳其與奧匈帝國勢力的交界，自古以來周邊的人們就在不同的統治、動亂、鎮壓、天災之中求生存，信仰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與跟隨土耳其統治者的穆斯林，已比鄰生活在河旁的城鎮維舍格勒(Visegrad)好幾個世代。儘管偶有爭吵對立，但真實的生活就像橫跨兩岸的橋，彼此的關係已緊密聯結在一起，成為生命共同體。

由鄂圖曼土耳其最偉大的建築師米馬爾·希南(Mimar Sinan)設計，一五七七年建成的橋，見證了血腥的戰亂、月光下的兒女情長、黃昏下村民閒嗑瓜子漫步徜徉、不同族群攜手對抗大洪水……，歷盡風霜的古橋屹立不搖，十孔拱圈優雅的弧線緩緩伸展，堅實而沉靜、簡練而深邃，如永恆般融入周遭的自然地景。

這一切，都由前南斯拉夫最偉大作家，一九六一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寫在史詩巨作《德里納河上的橋》。歷史隨著時間的沖刷流進河裡了，但百年古橋還在，安德里奇的文字還在，永恆地刻畫下維舍格勒這座小鎮的命運——它是巴爾幹地

內戰期間狙擊手在山丘上的飯店圍困塞拉耶佛，戰後荒廢至今。

撕裂與修復

前南斯拉夫分裂之一——波士尼亞篇



區四百多年來的縮影。

來不及寫進的事

但仍有些事並沒有隨河水流逝，也來不及被寫進諾貝爾文學的大作。

「今天是戰爭罪行的開端。」來自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Sarajevo)的記者阿米爾說。每年的五月二十五號，是紀念「維舍格勒大屠殺」的日子，今年已邁入第二十一週年。

低調簡約的橋身中央，凸起的兩層樓高石碑，曾是土耳其統治者張貼詔書之處，現在底下聚滿了黑壓壓的人群，有西裝筆挺的官員、著長袍戴帽的伊斯蘭教士，以及年長婦女一張張悲戚的面孔。教士作完祝禱儀式，音樂與歌聲響

起，包著頭巾的婦女們一個接一個開始哭泣、拭淚。

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波士尼亞東部的穆斯林遭到塞爾維亞政府軍(彼時仍叫南斯拉夫人民軍，簡稱JNA)與民兵殘酷屠殺。一九九二年在維舍格勒，就發生內戰初期最殘酷的大屠殺之一。

波士尼亞東部的穆斯林與塞爾維亞人已混居了幾百年，他們萬萬想不到塞族鄰居匆匆搬走後，手握最先進武器的軍隊與民兵這麼快就大舉進入(前南斯拉夫的軍火幾乎都在塞爾維亞生產製造)，要把他們「清洗」掉，以建立一個純粹塞族的土地，恢復失落已久的榮耀。

因為戰爭初期聯合國採取武器禁運，波士尼亞軍隊幾乎遠遠不是塞爾維亞部

隊的對手，更遑論這些鄉村地區的農夫村婦，完全手無寸鐵的情況下，他們被驅趕、轟炸、槍擊、刀砍，被一個一個像動物一般，帶到德里納河上的橋上，不分男女老幼，以最原始的方式割喉、丟入水中，三千人死亡或失蹤。鄰近一處歷史悠久溫泉區的著名飯店，則成為惡名昭彰的「強暴集中營」，穆斯林婦女被帶到這裡，任由塞爾維亞軍人日夜凌虐，連懷有身孕都無法倖免。

二十一年過去，維舍格勒這座曾經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們居住在一起的城鎮，已成為幾乎純粹塞爾維亞族的領地。不只失去親人也失去了家園，穆斯林只能在這一天來到橋上，紀念他們痛苦死去的至親。紀念活動的最後，人們

將三千朵玫瑰拋入河中，豔紅的玫瑰在湍急的水中轉眼就消失不見，至今仍有八百人無法辨認身分。

不知是有意還是碰巧，橋旁邊的飯店正在舉行吵雜熱鬧的婚禮，一輛輛親友的轎車大鳴喇叭遊街，典型的巴爾幹歡慶方式，車窗升起大大的塞爾維亞國旗，神氣地隨風飄盪。

歷史還魂

波士尼亞曾經是前南斯拉夫時代族群最融合的地方，信天主教的克羅埃西亞人、信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信伊斯蘭教的波士尼亞穆斯林，操著同一種語言、吃著相似的食物，他們是鄰居、同事、同學，甚至情侶或夫妻，幾乎沒有

德里納河上的橋在內戰時成為大屠殺場景，穆斯林每年來此憑弔。(攝影/張子午)



莫斯塔爾古橋毀於克羅埃西亞炮火，重建後成為觀光勝地，歷史教訓不能遺忘。





波士尼亞小檔案

■**獨立狀況**：內戰各方於1995年簽署《岱頓協定》，波士尼亞成為兩個聯邦組成的單一國家，穆斯林與克羅埃西亞族組成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聯邦占有51%領土，其餘49%領土屬於塞爾維亞人治理的塞族共和國。2000年又於布爾奇科(Brcko)設立特區，具有等同於其他兩個政治實體的相同權力，至此波士尼亞共有兩個共和國、三個政治實體。

■**面積**：51,197平方公里

■**首都**：塞拉耶佛

■**人口與種族**：384萬人，內戰結束後因不同政治實體的隔閡，一直未進

行全面性統計，最新數據為2000年的紀錄，波士尼亞穆斯林約占總人口48%，塞爾維亞人占37%，克羅埃西亞人占14%。

■**宗教**：約與三種不同族裔的人口比例相當，45%信仰伊斯蘭教，36%為東正教，15%為天主教。

■**經濟**：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79.65億美元，人均GDP為4618美元，排名世界第108。1990年代內戰的破壞以及私有化轉型的弊端，使得過去強盛的工業一蹶不振，現以服務業居多。官方失業率達25.2%，據信實際上為44.6%。



塞爾維亞小檔案

■**獨立狀況**：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爆發內戰，各共和國分崩離析後，塞爾維亞與蒙地內哥羅重組為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2006年蒙地內哥羅透過公投，宣布獨立，塞爾維亞亦於該年獨立。

■**面積**：81,361平方公里

■**首都**：貝爾格勒

■**人口與種族**：718萬人，塞爾維亞人占83%，

匈牙利人占3.5%，波士尼亞穆斯林與吉普賽人各占2%

■**宗教**：85%的人口信仰塞爾維亞東正教，為世界上第二古老的斯拉夫東正教會。

■**經濟**：國內生產總值GDP為450.64億美元，人均GDP為4440美元，排名世界第80，以服務業居多，工業次之。失業率達22.4%，為當前最棘手議題。

南斯拉夫分裂關鍵大事記

1914年6月28日	歐洲火藥庫：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在波士尼亞首都塞拉耶佛被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分子刺殺，同年7月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開啟一次世界大戰序幕。
1918年12月	南斯拉夫初現：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與鄂圖曼土耳其兩大帝國戰敗，在美國總統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下，以塞爾維亞人為中心，聯合南方的斯拉夫人組成王國，1929年正式名為南斯拉夫王國。
1941年4月	二戰爆發：軸心國入侵，南斯拉夫王國瓦解，國王彼得二世流亡希臘。塞爾維亞及蒙地內哥羅保皇派組成南斯拉夫祖國軍：「切特尼克」，與德軍展開游擊戰。
1941年4月10日	納粹傀儡：在獨立運動「烏斯塔沙」的基礎上，克羅埃西亞獨立國在納粹扶植下成立，建立集中營大舉殺害塞爾維亞人、吉普塞人與猶太人。
1945年11月29日	共黨勝利：在西方支援下，狄托領導的共黨游擊隊取代南斯拉夫祖國軍，成為抗德最大勢力，最終贏得戰爭，建立由六個共和國與兩個自治省組成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
1948年	與蘇聯決裂：不滿蘇聯以各種手段的干涉，狄托與史達林決裂，為冷戰時期共產陣營的首次分裂，南斯拉夫走上了開放式的社會主義體制。
1980年5月5日	強人去世：狄托逝世，結束長達37年的強人統治，權力出現真空，各共和國皆欲爭取領導權，尤以克羅埃西亞與塞爾維亞之間最烈。
1989年	極端民族主義興起：科索沃的自治權被取消，引發主要族群阿爾巴尼亞人不滿，塞爾維亞領導者米洛塞維奇藉由當地矛盾，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古戰場發表演說，煽動起極端民族主義。
1991年6月	內戰爆發：不滿強勢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雙雙宣布獨立，前者因未與塞爾維亞領土接壤加上族群單純，戰事僅十日即平息，後者則因境內有為數不少的塞族而持續至1995年。
1992年	波士尼亞戰爭：由於境內占三成的塞族抵制，波士尼亞的獨立面臨劇烈反彈，在塞爾維亞政府軍協助下，當地塞族與穆斯林及克羅埃西亞族爆發衝突，為南斯拉夫分裂後最慘烈的戰爭。
1995年11月	停戰協議：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交戰三方領袖於美國俄亥俄州簽訂《岱頓協定》，將約一半的波士尼亞領土畫分給塞族人成立自治共和國。
1999年	科索沃戰爭：塞爾維亞大舉鎮壓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獨立運動，導致成千上萬平民流離失所，引發國際關注，美國及北約以轟炸介入，迫使塞爾維亞停戰。
2008年2月17日	科索沃獨立：總理塔奇單方面宣布脫離塞爾維亞獨立，成為南斯拉夫解體後第七個國家。



莫斯塔爾被炸毀的銀行大廈戰後荒廢至今，當地年輕人藉由塗鴉賦予廢墟活力。



在地雷生還者協會的幫助下，因誤觸地雷失去雙腿的退伍軍人得以重建生活。

人會意識到對方的族群身分。

民族主義如同魔咒，在南斯拉夫領導人狄托(Josip Broz Tito)於一九八〇年逝世後，逐步由各聯邦亟欲擁權的政治領導者散播，並擴大為一發不可收拾的風暴。當時的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sevic)將極端的民族情緒推至最極致，抓住人心動盪的時機，以「大塞爾維亞主義」為號召，欲統一所有塞爾維亞人居住的區域。

當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相繼經過或大或小的戰爭尋求獨立之後，塞爾維亞的領袖再次舉起極端民族主義的大纛，散播「波士尼亞的穆斯林即將建立一個伊斯蘭教國家，並會迫害相對少數的塞爾維亞族群」的恐懼，並大力提供

塞族人武器，對穆斯林展開攻擊。

彷彿一夜之間冒出的民族狂熱，其實已深埋已久。一次大戰結束，隨著鄂圖曼土耳其與奧匈帝國的戰敗，長期在兩大帝國勢力下的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人，聯合成南斯拉夫王國，但這第一度統一的南斯拉夫並無法掩蓋在夾縫中不斷拉扯與撕裂的現實，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它瞬間就被強權分化，爆發激烈內戰。

傳統上深受德奧影響的克羅埃西亞加入軸心國陣營，在納粹扶植下成立法西斯政權烏斯塔沙(Ustasha)，大舉將成千上萬塞爾維亞人抓進集中營，殘酷地處決；同盟國陣營的塞爾維亞則由民族主義者及保皇黨人組成南斯拉夫祖國

軍，簡稱為切特尼克(Chetniks)，與共產黨游擊隊聯手與之對抗，但兩者之間後來又爆發內戰；穆斯林則分散在不同陣營，甚至有一支納粹親衛隊漢扎分隊(Handzar division)，對塞爾維亞人進行殺戮。

你殺我我殺你，一九九〇年代的內戰，讓人似曾相識地想起二次大戰在此發生的一團混戰。而當時的確就是將二次大戰時的歷史名詞當作標籤，簡化地貼在不同陣營之間：塞爾維亞人是切特尼克、克羅埃西亞人是烏斯塔沙、波士尼亞人更簡單直接地被叫作土耳其人，直接指稱他們在鄂圖曼土耳其統治期間改信伊斯蘭教，傾向統治者的事實。

用歷史的舊恨號召，還魂為新仇，或

許不是頭一遭，但加諸在巴爾幹人民身上的一切，說明了當過去的冤魂還沒有被平息時，某一天反撲的力道會是多麼駭人。

當狄托領導的共產游擊隊贏得二戰勝利，建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後，此前在這裡發生的一團混戰就此被當作不曾發生一般，被一黨獨大的歷史消抹掉，壓抑民族主義，並不斷宣揚、灌輸族群團結與兄弟情誼的理念，但另一方面，「回到自己的家裡，長輩常告訴下一代，你的祖父、父親或叔叔就是當年被某某殺害的，而那些人，還住在你家對面，如常地生活著。『有人某天要為此付出代價』，這樣的潛意識已存在一些人心裡。」貝爾格勒大學社



尋找身分 入土為安

一九九五年在斯雷布尼察發生二戰後歐洲最嚴重的種族屠殺，紀念牆上刻著罹難者姓名(上圖)。國際失蹤人口協會成員拼湊骨骸(左圖)、檢視DNA取樣(下圖)，以科學方法找出死者身分。當年七歲的尼亥在二十一年後才找出身分，得以在維舍格勒下葬(右圖)。

(右/張子午攝)



流經莫斯塔爾的內雷特瓦河將克羅埃西亞人與穆斯林分隔兩岸，戰後不同族群已難如以往般融合。

會科學院博士生，同時也是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巴爾幹事務評論員阿扎漢默(Vladimir Ajzenhamer)說。

除此內部深埋已久的糾葛，外部因素在這塊土地上從來沒有缺席，「克羅埃西亞一宣布獨立後，德國因想成為歐洲主導勢力，馬上第一時間承認，完全不留一點時間與空間，給各方之間有彼此斡旋、討論的空間，於是問題就跑出來了，那些住在克國的塞族人，不甘心就此成為少數民族，在塞爾維亞政府火上加油下，遂一發不可收拾地走向戰爭。」阿扎漢默提到，「輪到波士尼亞時，當地人其實試圖避免走向戰爭，因為他們知道，若發生的話，會加倍血腥混亂。」

住在波士尼亞的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穆斯林三個族群比例相當，在沒有一個占優勢的主導族群的情況下，戰爭果然在此地持續最久，留下的傷痕也最深。即使二十一年後，仍然叫人心痛。

希望入土 傷痛長存

橋上的追思活動之後，今年有七具確認出身分的遺體要在維舍格勒的穆斯林墓園下葬。內戰結束後，國際失蹤人口協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Missing Persons)多年來已建立一套先進的DNA比對系統，一一將被屠殺者的遺體拼湊比對，找出他們的身分，包括今



天這七位。

他們都是在從鄰近的佩魯恰茨(Perucac)湖被尋獲，二〇一〇年七月趁著水位降低時，工人前往維修水力發電站時，赫然在水壩周邊發現這些隨河水流到湖裡，卡在樹枝或泥灘之中的骸

骨，除了一九九二年維舍格勒大屠殺，甚至還有一九九九年科索沃戰爭的受害者，「估計有超過兩千具遺體在湖裡，此地是歐洲最大的亂葬崗。」波士尼亞失蹤人口協會主席馬索維奇表示。

七具棺木中，有兩具特別迷你，他們

是七歲的小男孩尼亥，埋在他的媽媽旁邊；六歲的小女孩符拉狄納，埋在她的母親與祖母旁邊。

「沒有言語能形容親人的痛苦，我弟弟的人生才正要開始，如果他還活著，今天就滿二十八歲，可能已經成家

立業，我們家有五個女兒，他是唯一的男孩。最初家人還抱著一絲希望，如今希望已死，痛苦持續。」小男孩的姊姊西奈說，她還有一個妹妹的遺體仍未找到。「我們知道誰是兇手，全是我們鄰居幹的，但沒有證據，無法將他們送進法庭，只能告訴孩子，不要忘記這些鄰居對我們所做的。」她強調。

小女孩的叔叔薩契爾說，這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一天，卻也感到安慰，因為他姪女的遺體已找到，姪女全家都遇害，僅有十個月的最小弟弟仍未找到。

經過上午在古橋上極度的悲傷及拋下玫瑰的儀式，下午在墓園時，親屬的情感張力似乎稍稍有些釋放，許多婦女與

身分的機構。

一九九六年G7高峰會時，當時的美國總統柯林頓呼籲成立國際失蹤人口協會，最初目的是要找出前南斯拉夫內戰期間無數無名死難者的身分，到現在它的影響力，已跨出巴爾幹半島，遍及世界各地，如協助內戰結束後的利比亞尋找近一萬名失蹤者的身分，甚至是因自然天災所致，如二〇〇八年重創菲律賓的風神(Frank)颱風中，近千死者的身分確認。

「當年我們進行的是相當前衛、革命性的實驗，我記得一九九八年時，所有人都說這耗費過大、技術上無法執行，不可能成功。但DNA讓不可能成為可

一九八四年的冬季奧運會在塞拉耶佛舉行，經過戰火的摧殘，雪橇賽道一片荒蕪(上圖)，當年熱絡的競技(下圖)恍若隔世。

(下/達志影像AP)

小孩坐在墓園周邊的草地上閒話家常，久別重逢的男人彼此問候，但當棺木一一入土，親屬接力用剷子埋下他們的摯愛後，沒有人能說出半句言語，除了拭淚與凝望著簡單的木製墓碑。

轉型正義的基礎

「雖然不幸的發生戰爭與屠殺，但另一方面，卻也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學習機會，十多年來，我們在這裡建立出一套科學模式，至今南斯拉夫內戰中已有兩萬七千名失蹤的罹難者身分被確認，占總人數比例近七成。」國際失蹤人口協會總監邦伯格(Kathryne Bomberger)說，該組織是全世界唯一有能力在大規模衝突動亂後的地區，鑑識無名死難者

能，以斯雷布尼察(Srebrenica)大屠殺為例，總計遇害的八千名死者中，至今已有約九成，近七千名的身分被確認，證明我們的工作不僅可行，且成功率遠超過當初的想像。」邦伯格強調。

發生在一九九五年波士尼亞東部的斯雷布尼察大屠殺，是強調人權的西方世界永恆的汙點。沒有人能相信二十世紀末的歐洲一隅，五天之內八千名穆斯林男子從世界上消失，且並非像當年納粹大規模有系統地用毒氣「解決」，而是以刀槍炮彈等原始方式殺戮。更叫人無法接受的是，當時斯雷布尼察才剛被聯合國規定為「安全區域」，禁止交戰或使用武器。這個南斯拉夫解體後最血腥的一刻，現在被定性為二戰後歐洲最嚴





重的「種族滅絕」(Genocide)。

或許是出於當年袖手旁觀的罪惡感，內戰結束近二十年來，國際社會對此事件投入極大的關注，以各種調查紀錄、口述歷史、紀念活動來釐清真相並使世人永不遺忘，而恢復這些死難者的身分，更是戰後社會邁入「轉型正義」的最重要基礎。

司雷布尼察大屠殺後，為了掩飾罪行，最初的亂葬崗在戰後又被開挖，許多死者被移到不同的地點，往往屍體的不同部分骨骸分散在不同地點，只有透過與歷年來家屬主動提供的龐大DNA資料庫比對，才能將完整的遺體拼湊出來，進而確認死者身分。

制裁，只有當這些步驟都完成時，正義才算伸張。」維索科市長芭畢奇(Amra Babic)說。

芭畢奇是歐洲唯一一位戴伊斯蘭頭巾的女市長。許多歐洲國家視伊斯蘭傳統頭巾為對女權與自由的剝奪，不時討論是否立法禁止，如法國明文禁止在公共場合戴面紗，世俗的伊斯蘭教國家如土耳其，也不鼓勵女性在公眾場合戴。二〇一〇年當選市長後，她卻毫不妥協地以這身裝扮進入公眾事務領域，在國內與國際上都引起不少側目。

「我已佩戴頭巾二十年，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芭畢奇說。自從丈夫在內戰中喪生，在獨立撫養三名孩子與龐大

祖傳三代的銅器鋪老闆準備上工(上圖)，公園裡的老人下著西洋棋(下圖)，塞拉耶佛的人們如常地迎向每一天。



「DNA的結構之美，就在於它的無可辯駁，科學證據讓人無法否認斯雷布尼察發生過的事。我來自美國，但在這裡，我們都是波士尼亞人。如果國際社會能幫助波士尼亞，成功處理這個議題，那麼明天我們或許也能夠幫助敘利亞或其他經歷複雜種族衝突的區域。在這裡學習的課題，讓整個世界都受惠。」邦伯格說道。

多重身分並存

國際失蹤人口協會的鑑識中心散布在波士尼亞的各個城鎮，包括距離首都塞拉耶佛約三十公里的維索科(Visoko)。「至今仍有許多遺體在停屍間未能確認身分，犯下戰爭罪行的罪犯也還未受到

的家庭、工作責任中，虔誠的宗教信仰是她的支柱。

因土耳其的統治歷史，波士尼亞有著歐洲最龐大的穆斯林社群，共約一百五十五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但此地的信仰態度一直十分世俗化，但到了九〇年代內戰後，漸有伊斯蘭復興的趨勢。除了個人因戰爭創傷而尋求心靈慰藉，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戰爭初期西方國家採取不介入的立場，使此地的穆斯林社群受到極嚴重的迫害，反而是其他伊斯蘭國家給予援助，在戰後也投入多項重建，宗教的影響力因而在此扎根。

在宗教壓抑的共產時代，戴頭巾被視為落後的象徵，「小時候除了老婆婆，

一九八一年時六位年輕人在默主哥耶見到聖母瑪利亞顯靈，從此小鎮成為前南斯拉夫最知名的朝聖地。

幾乎看不到有人戴。」而現在對她而言，戴頭巾代表選擇的自由，「我是歐洲人、波士尼亞人、穆斯林」，芭畢奇強調。就像曾經融合的波士尼亞，三重身分在她身上兼容並存。

或許是她的出線所帶來的激勵，在長期由男性占絕對主導地位的公眾事務領域，維索科市政廳的大部分成員卻都是女性。而這群女性現在要面對的，是上個世代因男性的戰爭所崩壞的一切。維索科曾經是繁榮的工業重鎮，前南斯拉夫最大規模的皮件工廠KTK總部在此，根據統計資料，KTK所生產的皮件一年可達到八千萬美元的出口產值。

「一九九一年時，全市共有一萬三千名受僱員工，大多在KTK工廠工作，但經過內戰破壞及私有化轉移的弊端，所有生產線都毀了。如今全市有九千名受僱員工，但有超過七千人失業，這是當前最棘手的問題，全國都不例外。」芭畢奇說。「對所有的波士尼亞人而言，戰爭的創傷經驗是永遠也忘不掉的，唯一的方法是藉由工作找到每個人的價值與定位，只有當經濟發展起來，過去的傷害與誤解才可能慢慢復原。」

音樂穿透界線

在塞拉耶佛這座曾是巴爾幹最多元開放的城市，當代波士尼亞民族音樂女歌手阿米拉·穆丁雅尼(Amira



Medunjanin)近年來努力以動人的音樂撥開陌生與誤解，詮釋出這片土地的精神，在西方獲得不小的迴響，被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譽為「巴爾幹的比莉·哈樂黛(Billie Holiday)」。

「在前南斯拉夫時代，大家都稱塞

拉耶佛是『小南斯拉夫』，它歡迎每個人到來，幾乎每個族群都是平等的，那很美。我個人認為，這也是為何一九九〇年代內戰期間，它受創最鉅，受苦最深，因為有人想要摧毀這長久以來的多元文化理念。」阿米拉說。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六年之間，塞拉耶佛遭到塞爾維亞軍隊包圍，山丘上布滿狙擊手、無日無夜的轟炸，被圍城整整四年，「沒有任何一個生命經驗像戰爭一樣，使我看見什麼才是最珍貴的，成為生命的指引。媒體關於我們的報導

大都是負面的，講到波士尼亞，馬上聯想到戰爭，而不是音樂，但音樂比戰爭更重要，這是我的使命，它已存在五百年，且依然活著。」她強調。

那「存在五百年且依然活著」的音樂叫Sevdah，土耳其語原意是形容因愛情而起的愁緒，後來逐漸指稱受土耳其影響，在波士尼亞流傳的民間音樂。土耳其民族滄桑濃烈音樂風格，留在這些斯拉夫人身上，變得深情而憂鬱。

在她的專輯與現場演出中，除了波士尼亞Sevdah，她還時常詮釋馬其頓、塞爾維亞、科索沃的傳統歌曲。「所有這個地區的傳統音樂都是我的養分，而它們都是互相影響並彼此相關的。」她強調。在共通的音樂面前，人為的對立與分裂更顯得荒謬與殘酷。

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在塞拉耶佛舉辦的Sevdah音樂節，由她擔任總策畫，邀請來自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蒙地內哥羅、阿爾巴尼亞等十個巴爾幹國家的音樂人，聚在一起交流，並合作共同演出。

「雖然每隔一陣子就是媒體或政治人物為了私利而濫用民族情緒，但幸運的，在一般人身上，開放與歡迎的精神並沒有被戰爭完全摧毀，依舊存在，我試圖在音樂裡傳達的，就是這個地方多元包容的真正面貌。」阿米拉說道。

民族、政治與宗教的界限彼此穿透消融，在深層流動的樂音中不再存在，不用刻意安排與設計，在普遍的情感與共通的文化中，讓人明白連結與療癒的希望所在。



「斯雷布尼察的母親」協會會長坐在貼

滿罹難者相片的辦公室，她先生已下葬，獨子的遺體則被埋在雷區，尚待專門機構清除。

撰文/張子午(經典雜誌撰述)
攝影/張雍(經典雜誌特約攝影)

告別漫長的冬日，初春的貝爾格勒洋溢著歡樂的節慶氛圍，人們悠閒地在街道上與公園內漫步，坐在戶外喝咖啡談天說地，又適逢五月第一個週日是東正教復活節，有長長的連續假期，許多人出城野餐郊遊，或者到山間海邊度假。

而對另一些人而言，這段日子除了是調劑身心的休假，更是重要的朝聖之日，朝向塞爾維亞人信仰的聖地：科索沃的佩奇(Peć)。

「小時候我常去佩奇，但後來戰爭爆發就此無緣重返，直到去年因研討會的機緣才在戰後第一度踏上，心情非常複雜。回到過去是你國家的一部分，現在當地的阿爾巴尼亞人卻以非常不友善的眼光望著你，感覺實在無比奇怪。」阿扎漢默打包好行李，準備和朋友開車到佩奇度過復活節。

儘管不會是段輕鬆的旅程，但對阿扎漢默來說，「那是塞爾維亞中世紀歷史的一部分，是我們精神文化的搖籃，當你真正在裡面時，你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瀕危的聖地

「這裡對塞爾維亞東正教的意義，就像梵諦岡之於天主教。」佩奇教區的約

儘管已被國際法庭逮捕，前塞軍領袖姆拉迪奇仍為部分塞族所尊崇，科索沃北部可見到他的肖像。

驕傲與重擔

前南斯拉夫分裂之二——塞爾維亞篇



佩奇教區是塞爾維亞東正教聖地，現由北約部隊駐守戒備，士兵們難得有空聆聽修女解說教堂文物。

凡主教(Bishop Jovan Culibrk)說。中世紀塞爾維亞王朝的黃金時代根植於科索沃，而從十三世紀開始，佩奇就是最高領袖牧首的所在地，塞爾維亞東正教現任牧首愛任紐(Patriarch Irinej of Serbia)二〇一〇年上任時，仍然在此登基。

只是登基以後，牧首並不會留下來，而是回到貝爾格勒，儘管是信仰精神的原鄉，實際上這片土地已不再屬於塞爾維亞人。「非常悲哀的事實是：佩奇這整座城市過去曾經有一萬五千名塞爾維亞居民，如今只剩下八人。」約凡主教說道。

一九九九年北約介入，大舉轟炸塞爾維亞後，粉碎了米洛塞維奇最後的「大塞爾維亞」野心，終結科索沃戰爭。之前被塞爾維亞軍隊驅離的阿爾巴尼亞人，在美國及北約協助下回到家園，最終於二〇〇八年宣布獨立。換成住在科索沃的塞爾維亞人節節敗退，原本居於科索沃的四十萬名塞爾維亞人，已有二十六萬被迫離開，而在歷年來間歇的族群衝突中，無數間教堂遭到焚毀破壞，包括神聖的佩奇教區。

「在前南斯拉夫時代，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發起要求自治權的大規模抗議時，教堂就在一九八一年被燒毀，二〇〇四年又在全國的動亂中遭到破壞。」約凡主教說。而這些衝突都並非近代的新鮮事，而是持續不斷的多舛歷



史。「你看到院區中央的石頭殘跡嗎？那是十四世紀末土耳其軍隊劫掠過的痕跡，後來奧匈帝國的軍隊還曾將教堂當成馬廄使用，許多十三世紀的壁畫直到二〇〇六年才修復完成。」佩奇教區已被特別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中的「瀕危世

界遺產」。

戒備森嚴的大門口停放著一輛裝甲車，還有沙包築起的掩護工事，得小心翼翼將護照交給站哨的北約科索沃維和部隊(KFOR)士兵，換證後方得進入參觀。「近年來局勢已經平靜很多，我

們在這裡不只為塞爾維亞人守護精神聖地，也是為全人類文明。」約凡主教帶著僅存的幾位神職人員、修女，孤獨地在飄搖風雨中燃亮這個民族的光。

要了解這個民族，以及他們在巴爾幹複雜的分合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或



雖然有著動盪的過去，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其實是一個充滿綠意的城市，多瑙河與薩

瓦河匯流處的風光平靜宜人。

許得先了解他們對歷史的自豪、對精神的追求、對犧牲奉獻的使命等種種近乎執念的深層意識，到底從何而來。

民族的驕傲與重擔

「當年的科索沃戰役是塞爾維亞民族認同的核心，關於那場戰役的歌曲到現在仍不停在民間傳唱。」塞爾維亞傳統女歌手史芭季奇(Svetlana Spajic)說，她從二十年前就開始在鄉間跟耆老學習傳統歌曲，如今已是世界音樂領域中重要的音樂家，並曾與大師級的行為藝術家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合作，「最純粹的傳統裡面有一股神祕的力量，不必摻雜任何現代元素，就能令今日的聽眾感到前衛而震撼。」她說。

一三八九年慘烈的科索沃戰役，塞爾維亞王國軍隊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全數殲滅後，黃金歲月就此一去不回。只是這場慘敗對塞爾維亞人而言，卻是史詩性的壯舉，代表這個民族為了全歐洲的基督教世界站在最前線，對抗來犯的土耳其人異教徒，並犧牲了自己。

當年的古戰場，現今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納(Pristina)近郊，豎立了一座巨大的紀念塔，上面刻著統治者拉扎爾(Lazar)大公在戰役前發出的詛咒：「凡流著塞爾維亞的血的人，若不到科索沃戰場作戰，將永無子嗣……」

這個深埋在歷史底層的誓言從來沒有被遺忘，五百年過去，在南斯拉夫最後歲月的一九八九年，米洛塞維奇在同一個地點發表了激昂的演講，用這場飽含恥辱、犧牲、復仇的戰役，號召出強烈



的極端民族意識，直接造成往後長達十年的戰爭與動盪。

「這純粹的精神力量被政治狂人濫用來煽動仇恨意識，已成為難以洗脫的汙點，在九〇年代成長的孩子聽到科索沃，永遠是一連串問題，很多人只想揮去這重擔，頭也不回往前走，這很悲哀，不了解自己的根源，怎麼長成枝葉繁茂的樹？」史芭季奇說。她的復活節也是在佩奇教區度過。

一九九九年北約轟炸塞爾維亞，迫使塞軍停戰，終結科索沃戰爭，前軍事總部廢墟仍矗立在貝爾格勒(左圖)。戰時記憶仍在前塞軍軍官伊果腦海縈繞不去，妻子艾莉克斯是重要的支持力量(右圖)。

對於真正「參與」過那十年的人而言，更是難以言說的沉重經驗。

戰爭證言

復活節前夕的受難日，伊果剛從工作的餐廳下班回到家後，便按照習俗，拿出去年一年放在客廳，象徵好運的彩蛋走到多瑙河邊，把蛋丟進水裡，象徵告別過去，回家後再選一顆剛染好色的蛋，代表邁向新的開始。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真正告別過去。

「過去十五年發生的事，你應該也知

道到了，許多我們的人都被送上海牙國際法庭(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簡稱ICTY)，許多的謊言、謊言、謊言……，除了政治包裝，什麼都沒有，我覺得非常噁心。」伊果斷斷續續說著，不斷嘆氣。ICTY在戰後以違反人道的戰爭罪行追捕、起訴多位塞爾維亞領袖，包括前總統米洛塞維奇，他在羈押期間於海牙病發身亡。

「當年我就在斯雷布尼察，我知道



『真正』發生什麼事。那是戰爭，不是『種族滅絕』！」一九九〇年代南斯拉夫內戰期間，伊果是塞爾維亞軍隊的軍官，按照現在西方的定論，當年他就是「斯雷布尼察大屠殺」的劊子手之一。「我知道我沒有殺任何老人、小孩，或犯下戰爭罪行。」伊果說。

「兩邊都持續互相攻擊，波士尼亞部隊在之前，對塞爾維亞村落發動多起突襲，屠殺許多村民，我無法形容在那邊看到的景象……，到死都忘不掉。」他痛苦地回憶著。有人要攻擊他的國家與



佩奇教區總主教約凡在教堂內替新生兒洗禮。雖然科索沃已不再屬於塞爾維亞，卻仍是

民族精神與信仰的中心。

族人，拿起槍來保家衛國，是身為國民的基本責任。

「我們後來包圍了波士尼亞軍隊，跟他們說：放下武器，舉白旗投降，沒有人會死。他們舉了白旗，一個半小時之後卻試著突圍，試問，我軍該怎麼反應？《日內瓦公約》第三十六條規定：若一方舉白旗投降後又再進行突圍，另一方可對他們毫不手軟。」當時景象在伊果的腦海仍然歷歷在目，大批波士尼亞軍隊突圍的方向，是遠在八十公里外，由波士尼亞政府掌控的圖茲拉（Tuzla），而彼時這麼一大段距離布滿了塞軍以及地雷，絕對不可能毫髮無傷地穿越，於是就產生大規模死傷。

「這是公平的戰爭，不是種族滅絕！」伊果堅定地重複說道。「『種族滅絕』的定義是什麼？系統性、有計畫、有組織地消滅整個人口，不分男女老幼。而所有的婦女與小孩都先讓他們搭上班車，去到自己決定的地方，全部存活，如何能叫做種族滅絕？」伊果強調。「戰後我跟我的同僚談過，了解到確實有五到六百名波士尼亞男性被俘虜後處決，這是戰爭罪行沒錯，但並非『八千』這個數字。」他補充道。

難以和解的法庭

儘管塞爾維亞總統尼科里奇(Tomislav Nikolic)於四月中接受波士尼亞電視台專訪時，破天荒以極低的姿態表示要「跪下來為塞爾維亞人在斯雷布尼察犯下的戰爭罪行致歉」，他仍然拒絕承認那是「種族滅絕」。

「大部分的塞爾維亞人無法接受將

塞爾維亞全國有百分之二的人口為穆斯林，世居在西南方的諾威帕札一帶，孩童正在學習祈禱程序。

這個沉重的名詞安在我們身上。那的確是令人髮指的恐怖罪行，也的確是塞爾維亞人所為，需要被審判、釐清真相。我們為塞爾維亞人所作的一切道歉，但是並非以國家的名義，因為那完全無法與納粹所為相提並論，後者是整個政府系統性的執行，而前者則是巴爾幹式的『復仇循環』。」阿扎漢默分析道。

塞爾維亞國內輿論普遍認為，國際法庭及背後所代表的歐美政治勢力，直到現在都對塞爾維亞充滿不公與偏見。當年北約部隊在現場袖手旁觀，遲遲不敢介入，無能阻止慘劇發生，為此西方長期感到良心不安，塞爾維亞理所當然成為必須嚴懲的對象。

另一方面，塞爾維亞也積極利用各種機會，在國際上為自己的立場發聲，試圖傳達他們也是受害的一方。聯合國大會本屆主席耶利米契(Vuk Jeremic)是塞爾維亞人，四月初時他即利用職權之便在聯合國舉辦論壇，討論國際法庭在處理前南斯拉夫內戰的公正性問題，此舉引來波士尼亞戰爭受害者家屬協會的強烈抗議，美國、加拿大、約旦等國甚至拒絕派代表出席，認為這又是塞爾維亞當局推卸歷史責任的舉動。

「成立國際法庭的目的是要讓正義伸張、仇恨平復，使整個區域能朝和解之路邁進，但目前看來是困難重重。每一方都還是站在自己人的立場，四分之三



的塞爾維亞民眾認為ICTY不公平，而克羅埃西亞也認為對他們不公平。」諾威薩(Novi Sad)大學心理學系教授，專門研究戰後心理創傷的畢洛(Miklos Biro)表示。「前南斯拉夫軍備大多掌握在塞爾維亞手中，於是有多犯下戰爭罪行的

機會，這也就是為何大多數被起訴的戰犯是塞爾維亞人，完全是機率問題，跟民族性無關。」他補充道。

但無可諱言的，戰後塞爾維亞的名聲一落千丈，「巴爾幹壞男孩」的刻板印象如影隨形。「關於巴爾幹戰爭的唯一

真相：所有人都對別人幹下可怕的事，沒有人是純潔無辜的受害者。不巧的是，塞爾維亞人永遠被認為要負最多責任、承擔最多罪惡，我們覺得很無奈也很不公平。但有時這種負面形象也是種優勢，比如到西歐時，人家聽到你是塞



五月四日是前南斯拉夫領袖狄托忌日，民眾來到他的陵墓致意並緬懷舊日。

爾維亞人，立刻反應就是倒抽一口冷氣悄聲說，『哇，不好惹的來了！』阿扎漢默自嘲地說。

現實困境

儘管十幾、二十幾年，甚至幾百年都過去了，科索沃及內戰問題卻持續籠罩，整個國家像是困鎖在重重迷霧中走不出來，加上長年以來政客貪腐不斷，經濟情況每況愈下，人們普遍對前景抱持悲觀的態度，尤其是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年輕人，使得塞爾維亞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危機。

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二〇一一年的統計，在一百三十三個受調查統計的國家中，塞爾維亞人才外流比

例為舉世第二，只比西非的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好一點。塞爾維亞學生會也在二〇一〇年做過統計，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學生計畫在畢業後永遠離開這個國家。

伊果在從軍前擁有貝爾格勒大學化工系學歷，擔任軍官期間也因表現優異多次被派駐海外，退伍後卻因國內就業市場景氣不佳而長期失業，直到今年初才在一間餐廳找到廚師工作，「這無妨，我本來就喜歡做菜。」伊果強顏歡笑地說著。

「我們交的稅和醫療保險有大半都被國家偷走了，除了抱怨，大部分人都很無力。在這裡什麼都要靠關係，專業能力不是重點，有沒有加入政黨、認識有



陵墓旁有各式狄托與南斯拉夫相關商品，對大多數人而言，那是最好的時光。

力人物才是關鍵。」伊果的妻子艾莉克斯在社區大學教英語，有一半的朋友都在海外工作，她正準備申請一個美國基金會的補助計畫，希望能赴美進修。

「我算是幸運的，一直在社會科學領域研讀、發表論文，並且在半島電視台擔任評論員累積經驗。我一個最好的朋友大學專業是政治學，現在在開卡車。大部分年輕人很難以學以致用，甚至得在咖啡館、餐廳打黑工，沒有任何保障。」阿扎漢默說。

因為戰爭破壞與共產解體後非法的私有化過程，幾乎所有的產業都凋零不振，而政府更缺乏長遠的政策規畫，不是把既有的基礎賣給外資，如曾經在南斯拉夫時代生產傳奇Yugo汽車，行銷到

歐美的Zastava公司已出售給義大利的飛雅特(FIAT)，就是在等待外資的路上，連最基礎的農業也不例外。

位於塞爾維亞北部的伏伊伏丁那(Vojvodina)是全國土地最肥沃的地區，居然因缺乏灌溉系統，一到了炎夏作物就死亡，更令人無法置信的是，該地區周遭並不缺乏水源豐沛的河流，這些基礎建設在前南斯拉夫都有，只是在戰爭時被摧毀後就沒再修復。最近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表達出投資意願，可能租下伏伊伏丁那的土地發展農業，兼之發展灌溉系統。

復活節前一天的五月四日，貝爾格勒郊區的一個小山丘上，陸陸續續來了許多的人，個個充滿虔敬之情，幾乎像是



諾威帕札的公園有許多帶著幼兒的年輕母親。此地出生率為全國最高，政府卻投注最少

資源，許多居民認為自己像次等公民。

另一種朝聖。

這一天是前南斯拉夫最高領袖狄托的忌日，他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上滿是鮮花，媽媽帶著身著迷你版共黨游擊隊裝束的小孩、年輕的大學生、老夫老妻，不分年齡與階層，從不同的國家來到這裡，悼念這位令人懷念的領袖，悼念曾經是一個國家的南斯拉夫。

沒有一個人不懷念狄托，沒有一個人不懷念南斯拉夫。

最好的時光

「想到南斯拉夫，我想到自由，移動的自由。曾經，拿著南斯拉夫護照的我們，幾乎到全世界各地都通行無阻。」波士尼亞的女歌手阿米拉說。多麼奇怪！一個極權的共產國家，竟然會和自由畫上等號。

「想到南斯拉夫，我想到小時候每年夏天去克羅埃西亞的海邊度假，也想到在司普利特(Split)、扎格拉布(Zagreb)的克羅埃西亞好友，還有去塞拉耶佛玩時吃到的土耳其傳統甜食果仁蜜餅(Baklava)。」阿扎漢默說。盡是非常鮮明、快樂的回憶，就像被完整呵護的幸福童年，六個共和國就像一家人，沒有仇恨與傷害。

狄托在一九四八年向史達林說「不」，不願意像其他共產國家跟在蘇聯老大哥的屁股後頭，就此發展出一套獨一無二的路線，使南斯拉夫成為一個自外於鐵幕內的「非典型」共產國家。

對內，狄托淡化各民族的差異，強調南斯拉夫的集體認同；對外，他積極聯合美蘇兩大強權之外的



貝爾格勒碉堡城牆旁的武器博物館瀰漫濃厚的戰鬥氣息，從土耳其帝國時代一直到二次

大戰，此地發生多次激烈的戰鬥。

世界各國，倡導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與歐亞非等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將南斯拉夫發展成冷戰時期的緩衝區，贏得世界各國領袖的信任與敬重。除了少數如美國、瑞士、希臘等國，南斯拉夫國民不用簽證就能到世界各國旅行，那時候南斯拉夫護照在黑市的價格超過一萬美元。

阿扎漢默還記得，從小在學校裡就被灌輸狄托偶像崇拜，有時老師會叫同學們排排站好，問說誰是你最敬愛的人，沒有例外的，每個人的第一名都是狄托，接下來才是爸媽。而這樣的敬愛，並沒有隨著強人去世，強權瓦解而消失，而是日益提高，恐怕是舉世無雙的例子了。

「毫無疑問地那是一黨專政的極權時代，但卻是自由的極權社會。」畢洛說。「即使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也會說狄托的時代比現在好得多。那時有非常好的教育、醫療、社會福利，薪水與退休金都很理想；文化多元，我們可以看各國的電影、聽各種世界音樂。對其他共產世界的人而言，這簡直是難以想像的。」他補充道。

對照南斯拉夫解體後持續將近二十年的戰亂動盪，狄托時代的繁榮安逸實在很不真實，彷彿屬於另一個世界。就像偶然想起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抬起頭來只是日益艱難的現實世界。

「巴爾幹地區數世紀來累積的仇恨記憶，很難用任何方式化解，只有在南斯拉夫的幾十年期間有短暫的和平。那是個偉大的國家，它的不存在是巨大的遺憾。」阿扎漢默感嘆地說。

